

中美衝突的本源因素及 不確定性

倪子雄

在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人們對國際局勢談論得較多的話題是：「中美之間會爆發戰爭嗎？」「中美戰爭何時爆發？」「中美之間將爆發何種規模的戰爭？」這些問題都難以回答，不過有一點卻是明白無疑的：中美之間存在着深深的敵意。本文將着重分析這一敵意的根源、結構、背景、性質、現狀、趨勢及「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後可能的變化。

一 中美對立的根源及歷史可提供的經驗

從表面上看，也就是大多數國際問題專家認為的那樣，台灣問題似乎是中美產生敵意的主要根源，但從深遠的歷史角度和歷史經驗來看，台灣問題只是中美衝突表面的聚焦點之一。中美之間的敵意根源於兩個因素，一是意識形態的對立；二是正在崛起的強國與現存強國的對立。這兩種對立都屬水火不相容的性質，並且具有相互誘導的特點。前者發展至極端，可導致西方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伊斯蘭的一手執《古蘭經》一手執劍、大革命後的法國同七次反法聯盟的對抗、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抗；關於後者，局限於短時段的考察是難以作出正確判斷的，需在長時段裏尋找規律或加以研判，即應從以往的歷史中考察這種類型的衝突的一般規律和模式，可能會給我們以相當的啟示。比如古希臘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對峙、迦太基與羅馬的衝突、奧斯曼土耳其同威尼斯的交鋒、西班牙與英國的抗衡、普魯士同法蘭西的對抗、英國同德國及美國與日本的對抗等等。以往歷史表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只要符合上述一種，敵意和衝突就很難化解。不幸的是，這兩種勢同水火、互相誘導的對立都被中美關係所包括。

中美之間存在着深深的敵意。表面上看，台灣問題似乎是中美敵意的主要根源，但從深遠的歷史角度和歷史經驗來看，台灣問題只是中美衝突表面的聚焦點之一。中美之間的敵意源於兩個因素，一是意識形態的對立；二是正在崛起的強國與現存強國的對立。

中美之間的敵意能否化解？中美兩國能否擺脫歷史的宿命而避免未來的衝突？考察曾經有過的中美「蜜月」現象，或許有助於認清這一問題。中美之間有過兩次「蜜月」——抗日戰爭和前蘇聯擴張時期。通過對這兩次「蜜月」的分析，不難總結出中美交往的一般規律：當中美面臨共同敵人威脅，且單憑各自的力量不足以與之抗衡時，兩國才會放棄敵意，變得友好甚至結盟。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一戰前的英法關係，法國和英國戰前曾非常對立，差點動武，由於德國咄咄逼人的勢頭成為英法共同的威脅，兩國在共同敵人的壓力下，一攬子解決了他們之間的分歧，終於化敵為友。若要恢復中美「蜜月」，除非目前出現某個國家或某種新的因素，替代前蘇聯的角色，對中美再次形成共同威脅。所以，最需要做的是尋找共同的敵人和共同的威脅。然而，舉目四望，目前國際社會中，哪些國家和哪些因素能夠共同威脅中美兩國呢？貿易、印度的核武器發展計劃、國際恐怖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等等，都遠遠不足以取代前蘇聯而構成兩國共同的、嚴重的威脅，今後是否出現也不得而知。

經濟互補與戰爭衝突存在着兩種模式：一是經濟互補不能消除戰爭，二是經濟互補能夠消除戰爭；關鍵取決於相互依賴的程度。如果建立一個理論模型的話，其中必有一個決定性的臨界點，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達不到這一臨界點，則不足以消除敵意和避免戰爭。兩次世界大戰表明：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似乎並不能消除深深的敵意，從而避免戰爭。

有人認為，只要加強貿易來往，造成中美經濟結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局面，兩國和平共處就有了保證。然而，這種想法並非絕對可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和德國的經濟往來也很密切，按照俄國學者烏特金(A. Уткин)的說法：「當時相互依賴確實達到了令人難忘的規模」，過去打仗無非是為了財富，現在創造財富要靠大家協作，還有甚麼理由要打仗？據此歐洲到處瀰漫着樂觀主義情緒，有人甚至斷言「人類已經重返伊甸園」，然而，隨後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將「貿易消除戰爭」的看法擊得粉碎。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中日經濟交流也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由於甲午戰爭以來，兩國積怨太深，中國反日情緒經常導致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本國內經濟形成較大的衝擊，從而加劇了政治、軍事衝突的力度。C·沃爾茨、M·艾爾曼、M·布朗等專家認為：「如果國際社會的成員彼此感到恐懼，相互依賴只會增加衝突的可能性。」兩次世界大戰表明：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似乎並不能消除深深的敵意，從而避免戰爭。

但也有相反的情形。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歸屬問題，曾是德國和法國不共戴天和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戰後歐洲經濟共同體導致了政治上的合作，乃至發展到今天歐盟的出現，經過半個多世紀經濟協作和源於經濟協作的政治合作，德、法恐怕再也不會為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歸屬打仗了。

通過對上述兩種相反情形的考察，可以發現經濟互補與戰爭衝突存在着兩種模式：一是經濟互補不能消除戰爭，二是經濟互補能夠消除戰爭。深究下去，其中關鍵取決於相互依賴的程度。如果建立一個理論模型的話，其中必有一個決定性的臨界點，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達不到這一臨界點，則不足以消除敵意和避免戰爭，反而將這種相互依賴關係變成相互報復的資源，徒增一個新的引爆點，從而加劇了衝突的激烈程度；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達到並越過這一臨界點，則可消除敵意阻止戰爭。假如筆者這一從歷史經驗裏提煉出來的「經濟互補—戰爭衝突」的理論模式能夠成立，那麼，現在的問題是：中美經濟相互依賴

的程度是否已經達到了這一臨界點？朱鎔基總理最近在清華大學管理學院的講話以及賴斯(Condoleezza Rice)在〈促進美國國家利益〉(“Campaign 2000—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一文中的觀點表明，現實的情況是遠沒有到達這一臨界點，因而「貿易消除敵意和衝突」的模式至少不適用於現在乃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中美關係。

我以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困擾中美兩國最大的實質性問題是：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將來要幹甚麼。這是一個讓雙方都不知所措的問題。因為國際關係包括兩重性質的互動，一是雙方或幾方的互動，二是現在與將來的互動。美國不知對方將要幹甚麼，也就不知道自己現在應該幹甚麼。現在的困難在於：中國將來如何對待美國要根據美國將來如何對待中國來確定，而美國將來如何對待中國又需根據中國將來如何對待美國來確定，由於中國未來強大後走向不明(也不可能明了)，所以，中美關係今後的短期互動雖呈現表面的邏輯性，但長遠互動在本質上處於盲目狀態。

中國未來走向不明必然給美國帶來兩種困惑甚至恐懼：一種是未來中國可能威脅自己，由於現在沒有加以遏制，最後被動地捲入衝突；另一種是本來中國不會同自己發生衝突，但因錯誤判斷中國而採取強硬措施，最終「弄假成真」，導致了將來與中國的衝突。由於中國未來走向事實上不可能有答案，美國將在較長的時間裏無法擺脫這兩種恐懼，美國對華政策也將長期徘徊於鴿派和鷹派之間而不得要領。

二 西方文明傳統與美國對華政策及可能的後果

一個國家無論政治、軍事、外交均需要預設將來的目標，以便於引導當前的行動。對於正在迅猛崛起、向現代化作強行軍的中國未來走向，美國需要答案，但是，這個問題今天不可能有答案，歷史上哪個國家能夠預測出自己的命運？任何國家預設的目標或對世界的承諾，都屬一代人的主觀願望而已，不能代替子孫後代的想法。怎麼辦？根據人類一般行為規律，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社會中，美國現時遵循兩種基本的思維途徑採取行動：一，以自身文明傳統的行為方式為基礎來理解中國追求富強的企圖和目的；二，以「絕對保險」的思路籌劃未來，並規定今天的任務並採取行動。

細而言之，美國從骨子裏不相信「中國將來強大了也決不稱霸」的承諾。這跟他們的文明傳統有極大關係，從古希臘以來，富裕生活和商業貿易、海外殖民、軍事擴張、爭奪制海權、強權稱霸在歐洲文明史的發展過程中是密不可分的，強大與稱霸幾乎是同義語。這種文明傳統培育出的思路，覺得強大而不稱霸是不可思議的。東方農耕文明由於其特有的生存方式，財富源於土地耕耘而非開拓海外市場，生存與發展不必與海上貿易、制海權、軍事擴張掛鉤，強大

困擾中美兩國最大的實質性問題是：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將來要幹甚麼。中國未來走向不明必然給美國帶來兩種困惑甚至恐懼：一種是未來中國可能威脅自己，由於現在沒有加以遏制，最後被動地捲入衝突；另一種是本來中國不會同自己發生衝突，但因錯誤判斷中國而採取強硬措施，最終「弄假成真」，從而導致將來與中國的衝突。

和稱霸並不構成必然的關係。中國的歷史基本上可以證明這點。簡言之，西方文明的邏輯是「強大必然稱霸」，中華文明的邏輯是「強大未必稱霸」。但由西方傳統孵化出來的美國在理解東方文明這一特點上存在着難以逾越的障礙，這是中美兩國打交道時深層的、潛意識層次裏的衝突，也可看作「文明的衝突」。既然強大必然意味着稱霸，那就必須遏制，所以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及採取遏制政策的根源，歸根結柢來自歐洲文明傳統和歐洲的歷史經驗。

既然作出這樣的判斷，必要的保險措施就得跟進，美國必須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國的強大。三個例子可以說明問題：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將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台灣問題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砝碼，這點在今後任何一屆美國政府（不管強硬派還是緩和派）都不會含糊。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公開聲言將不惜任何代價協防台灣，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也一樣，只不過用另一種語言——兩支航母編隊表達了同一個意思。美國不支持「台獨」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同時反對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暴露了美國的另一種心態：即想最大限度地把台灣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長遠戰略籌碼，又不願為此付過多的代價，而美國至今的困惑是：不清楚台灣作為戰略籌碼在遏制中國時分量到底有多大，因此也弄不清楚自己所付代價的限度在哪兒。

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出於「絕對保險」的思路。美國相信：經濟生活、經濟結構的變化最終要導致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將中國未來發展納入美國理想的預設軌道不是不可能的事。另外，一個傳統農業社會直接向工業社會或後工業社會的轉型將面臨巨大困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激化中國原本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經濟轉型和政治轉型會使中國焦頭爛額，一旦轉型失敗將陷於畸形發展的泥潭，成為「廢人」。這樣的先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比比皆是。這既符合美國根本利益，其中又暗藏殺機，所謂「一石二鳥」也。所以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都「支持」中國「入世」。

另一個保險措施是建立國家導彈防禦體系。這對美國國家戰略來說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地區性的。其中包括三個層面的利益：第一，美國將在相當程度上擺脫同對手互為核人質的地位，而處於對手單方面成為自己的核人質的有利、有力地位。並有可能使全世界有核、無核國家都單方面成為自己的核人質的絕對霸權地位。第二、可徹底擺脫所謂「無賴國家」利用核武器「四兩撥千斤」的威脅。第三，導彈防禦體系是遏制中國的一張大牌，如果中國參加軍備競賽，可能像前蘇聯一樣被拖垮，不然，只能成為美國的核人質。因此，導彈防禦體系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是「一石三鳥」。

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比克林頓政府更趨極端，但如前所述，中國未來走向是沒有真實答案的，「絕對保險」措施是建立在「虛擬」的答案或前提上的，即「中國將來肯定會威脅美國」僅僅是一種虛擬假設，把國家長遠戰略和社會資源動員

中華文明的邏輯是「強大未必稱霸」，西方文明的邏輯卻是「強大必然稱霸」，因此美國從骨子裏不相信「中國將來強大了也決不稱霸」的承諾。這跟他們的文明傳統有極大關係。既然強大必然意味着稱霸，那就必須遏制，這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及採取遏制政策的根源。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則比克林頓政府更趨極端。

建立在虛擬性質的基礎上，其不明智、弄險的性質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肯定，任何一屆美國政府、包括小布什政府，如果把對華政策建立在這一「虛擬」的前提下，內心都是不踏實的、都會激起國內另一派戰略思維的強烈反對，因而也可預料任何過份強硬的對華政策是不會長久的。

但上述分析都屬於現時狀況的分析，不能代替歷史分析。從歷史縱向看，任何正在崛起的國家都將自動地成為美國的假想敵。展望前景，中美雙方的感覺都極差。回到前面的問題，根據歷史經驗，既然中美敵意的根源由兩種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構成，一時又無法化解，那麼中美關係就可能出現兩種前景，一是敵意將完全按自身的邏輯毫無抑制地展開，台灣問題、西藏問題、駐南使館被炸、撞機事件、法輪功等等，都會加深、加速敵意的積累。歷史一再表明，如果兩個國家的敵意是建立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基礎之上，那麼這種敵意在經過一定時間和事件的積累後，必定趨於極端而到達其質變終點，爆發重大的戰爭衝突是遲早的事，戰爭醞釀期間會有緩和的因素出現，但僅僅起到拖延的作用，醞釀的方向是始終不變的，除非出現某種因素能夠消除敵意的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塞拉熱窩事件」是個典型的例子，最初誰也沒想到斐迪南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被刺會引發大戰。當時歐洲主要國家首腦都極想避免戰爭，但最後都無可奈何地投入戰爭。極具戲劇性的是：東面的奧國皇太子被刺，大戰卻以西面的德國實施「史利芬計劃」，穿越中立國比利時向法國實行大迂迴作戰開始。歷史的教訓是：敵意的積累、從量變到質變、完成戰爭準備，才是大戰醞釀的轉捩點，沒有「塞拉熱窩事件」，其他事件也會引發大戰。

這裏引出一個重要問題，即敵意積累在量變到質變的旅途中也存在着一個臨界點，過了臨界點，戰爭雖然不一定馬上爆發，但將不可避免。從以往經驗來看，臨界點的標誌是雙方都完成了軍事部署，而且雙方都在不知不覺中越過臨界點。因為在敵意環境下，每個國家都一方面盡量爭取和平，另一方面要做好軍事準備，以免不測。這種想法和做法完全正確，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國家都會這樣做，否則將誤國誤民。但這種完全正確的選擇掩蓋了一個致命的、導致戰爭的因素：做好戰鬥準備和沒有準備同對手打交道是不一樣的，就像一個夜行者帶着手槍和沒帶手槍碰到搶匪時反應是不一樣的。沒有做好戰鬥準備時可以妥協、忍讓，做好戰鬥準備後就會變得不妥協、不忍讓。雙方都因完成戰爭部署、覺得未必會輸甚至勝券在握而在某些事情的交涉上變得強硬起來，沒有了迴旋餘地，最終導致軍事攤牌。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怪圈，這個怪圈可表述為：「因為他們當初作出了正確的選擇，所以他們必然走向戰爭。」目前，中國的作戰部署是要打贏一場高科技的局部戰爭，美國的作戰部署過去是在全球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現在，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Donald H. Rumsfeld) 考慮把戰略重點由歐洲轉向亞太，由打贏兩場局部戰爭變為確保一場戰爭，雙方的假想敵都很明確。目前雙方顯然還未準備完畢。如果筆者提出的「戰爭臨界點」

從歷史縱向看，任何正在崛起的國家都將自動地成為美國的假想敵。歷史一再表明，如果兩個國家的敵意是建立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基礎之上，那麼這種敵意在經過一定時間和事件的積累後，必定趨於極端而到達其質變終點，爆發重大的戰爭衝突是遲早的事，除非出現某種因素能夠消除敵意的根源。

理論模式能夠成立，則不妨對照一下，中美兩國距戰爭與和平的「臨界點」還有多遠？中美兩國是否意識到雖不願戰爭卻已不知不覺地迅速接近這一「臨界點」？所以，中美之戰雖然在時間上難以預測，但可判斷，中美雙方完成各自的軍事部署、演練完各自的「史利芬計劃」之日，很可能就是他們越過戰爭與和平的臨界點之時。接下去就是時間、規模大小的問題了。

歷史上迦太基同羅馬的對抗有點類似現在的中美對抗，前者地理上隔地中海相望，後者隔太平洋相望。前者相爭始於西西里島，後者衝突始於台灣島。在羅馬元老院裏，「迦太基威脅論」佔主導地位，一個叫加圖的元老在元老院演說反覆強調：「迦太基必須消滅」。美國某些議員則經常在國會裏散布「中國威脅論」。古代布匿戰爭的結果是：擁有絕對制海權的羅馬人摧毀了喪失制海權的迦太基。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羅馬起初並沒有一定要消滅迦太基的意圖。儘管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也別忘了歷史有驚人的相似。

我以為中國作為新興強國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自己走向強盛、並在與老牌強國不可避免的碰撞中盡可能降低成本、少付代價？這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應避免以重大代價——通過大規模戰爭衝突、甚至像二戰中的蘇聯冒滅頂之災的風險取得強國地位的傳統老路。這一原則應當成為中國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外交事務的核心原則。

三 中國的應對原則

面對強手，中國如何應對？我以為中國需確立一個應對的基本原則，並以此作為處理一切具體事務的核心原則。作為新興強國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自己走向強盛、並在與老牌強國不可避免的碰撞中盡可能降低成本、少付代價？這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具體而言，中國的長遠戰略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避免走近代以來英、法、日、美、俄等國高成本的強盛之路，即避免以重大代價——通過大規模戰爭衝突、甚至像二戰中的蘇聯冒滅頂之災的風險取得強國地位的傳統老路。這一原則應當成為中國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外交事務的核心原則。認清這點就不難發現，台灣問題並非中美關係中最重要問題，處理台灣等一系列外交問題均以符合上述原則為準。

中美兩國處於相互恐懼中，這種恐懼是下意識的，來自它們各自最痛苦的歷史經驗。中國的歷史經驗是被異族征服、割地賠款、領土分裂；美國是綏靖政策帶來的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猖狂，尤其是沒有及早遏制日本，讓其坐大。「珍珠港事件」引爆的太平洋戰爭給美國留下極深的記憶。因此，很難說美國不是根據自己的痛苦經驗來解讀中國未來走向的。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美國把我們當成主要對手，而是要擺脫痛苦經驗對我們判斷力的干擾，弄清美國對我國的真正威脅是甚麼。我國歷史上傳統的威脅是被異族入侵、征服或領土被割讓，但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畢竟超越了過去的傳統做法，美國雖然想獨霸世界，但畢竟有別於歷史上的蒙古和滿清、以及近代以來的日本，企圖傾其國力入侵、征服、併吞我國領土。就這個意義上，美國對中國沒有實質性的威脅。美國對台灣所持的態度，雖然客觀上造成我們現時的分裂，但歸根結柢出自西方傳統的商業利益，而非「東方式」的領土

吞併欲望。當然，美國希望中國四分五裂，或成為李登輝所希望的被大卸七塊。這樣，中國永遠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但前提是：美國不能付太大的代價，傾其國力冒險為之，美國決不會幹；假如四分五裂的中國以另一種方式威脅美國在中國的市場、東亞乃至國際安全體制，美國也不樂意。所以美國希望中國穩定並非全是假話，其中反映了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另一種擔憂，既反對台灣獨立，又反對大陸動武的方針就是明證。在此種情形下，老子的「柔弱勝剛強」應是外交策略的核心（鄧小平外交策略核心思想的傳統即源於老子哲學），中國同美國打交道尚有很大的迴旋餘地。「好風憑借力」，我們可借助美國守住「一個中國」的底線。以後要謹防的是：美國為扯我們的後腿而冒險突破這一底線。

我們要慎重考慮反對「霸權主義」的問題，霸權是歷史自然形成的，國家強盛到了沒有對手的地步，必然以正義的名義在世界上為自己牟取利益，也必然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只要國家不退出歷史舞台，任何國家到了這種地步，自然而然就獲得了霸權。所以，霸權不是主觀上想拿就能拿到，想推就能推掉，想反就能反得掉的。退一步說，即使反霸，也是全世界國家的事情，不是天定給某一個國家的任務。因此，與其以弱勢對強勢，引火燒身，不如敬而遠之，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檢討近年的外交得失，中國在科索沃問題上強出頭與美國戰略重點由歐洲向亞太轉移不會沒有關係。刻意「反霸」無異自己撿起一個大包袱背上，爭取國際多元體制固然有利，但應該仔細考慮成本和代價問題。

對於現今和將來的鷹派上台，中國不到萬不得已（如台灣獨立），不要輕易對鷹派的強硬對華政策採取激烈的、無法控制後果的反應，不應被動地與美國鷹派發生「互動」，當持「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對待之。如果中國被動地「跟進」，與鷹派發生「互動」，則會「無中生有」，美國鷹派預設的虛擬前提將被中國不明智的被動反應證明為「事實」。

「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客觀上將對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產生深遠而廣泛的影響，目前美國雖然態度強硬，但終將被迫全面檢討它的全球戰略，其中包括以往的對華政策，這有助於沖淡中美關係的敵對性。

四 「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於中美關係

當前，全世界還來不及從「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的震驚中恢復過來，但這次恐怖主義事件客觀上將對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產生深遠而廣泛的影響，目前美國雖然態度強硬，但終將被迫全面檢討它的全球戰略，其中包括以往的對華政策，這有助於沖淡中美關係的敵對性。

「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具有廣泛的解讀意義，它似乎再次表明，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關於冷戰結束後下一輪將是文明衝突的預見，正通過「海灣戰爭」、「波黑衝突」、「科索沃戰爭」、「東帝汶事件」和這次恐怖事件逐漸得到證實。如果未來國際社會真是一場文明間的衝突，那麼儒家文明已經佔據了最有利的坐山觀虎鬥的位置。



既然美國已經與國際恐怖主義接上火，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再與中國為敵，不然，儒家文明與之展開正規戰，伊斯蘭文明與之展開游擊戰，美國的日子恐怕很不好過。因此，這次恐怖主義事件後，中美關係可能會大為改善，中國承受的來自美國的壓力將大為減輕。

布什總統聲稱這是戰爭行為，從單純軍事角度而言，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即是以往游擊戰的國際化，或曰「國際游擊戰」。無論過去、現代、將來，這種戰爭方式的共同特點是不按強者的軍事遊戲規則行事。只要具備「獻身精神」或「亡命精神」，它就難以被戰勝（也許它就是最高形式的戰爭，老子曰「大象無形」，那麼，最高形式的戰爭是看不見戰場也沒有正規軍隊交戰的）。然而，美國又不會屈服於國際恐怖主義，否則就真的成了紙老虎而淪為笑柄。可以預言，美國可能會被國際恐怖主義長期纏住。

這次恐怖主義事件雖然不屬於中美兩國共同的威脅，但對美國而言，國際恐怖主義極有可能取代前蘇聯的角色，而且比蘇聯更具威脅。與此同時，國際恐怖主義也極有可能取代美國的「中國威脅論」，至少將之降至次要地位。美國應該明白，中國對自己的威脅程度離

恐怖主義還差十萬八千里。而且中國是遵守公認的軍事遊戲規則的，既然美國已經與國際恐怖主義接上火，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再與中國為敵，不然，儒家文明與之展開正規戰，伊斯蘭文明與之展開游擊戰，美國即便有西方盟國的支援，日子恐怕很不好過。

因此，這次恐怖主義事件後，中美關係可能會大為改善，中國承受的來自美國的壓力將大為減輕。另外，由於國際恐怖主義並沒有形成對中國的真正威脅，所以美國將有所求於中國，因而也不得不放棄過去的一些強硬做法，而中國在台灣等問題上亦可相機行事。

中美兩國都已認識到兩國的關係將影響他們後代子孫的幸福，人們應該相信中美兩國主觀願望肯定都不願發生戰爭，正如我們至今應該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和德國都不願發生戰爭。然而，在長遠的、處於盲目性質的中美關係互動中，如何避免戰爭衝突，取決於中美兩國現在和未來政治家的智慧，而不是他們的願望。